

[美] 马丁·贝尔纳 (Martin Bernal) 著
郝田虎、程英 译

黑色雅典娜： 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第一卷：构造古希腊 1785—1985
Volume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K103
141

黑色雅典娜： 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美] 马丁·贝尔纳 (Martin Bernal) 著
郝田虎、程英 译



第一卷 构造古希腊 1785—1985

Volume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 第1卷：构造古希腊.
1785~1985/(美) 贝尔纳著；郝田虎，程英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7
ISBN 978-7-5463-5631-0

I. ①黑… II. ①贝…②郝…③程… III. ①西方文化—
文化史—研究—1785~1985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5801 号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

第一卷：构造古希腊 1785~1985

作 者：[美] 马丁·贝尔纳 (Martin Bernal)

译 者：郝田虎 程 英

出 品：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周殿富

策 划 人：严搏非

责任编辑：宋 春 孙祎萌

封面设计：八月之光

开 本：960mm×1300mm 1/32

印 张：15.5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 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http://www.jlpg-bj.com/>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5631-0

定价：5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译本序

我很高兴《黑色雅典娜》第一卷能翻译成中文，这有若干理由。首先，它连接了我生命中的两个学术爱好，中国和“黑色雅典娜”规划。从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之前，我和中国的联系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七岁时，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而非震旦》(*China but Not Cathay*)，当时他是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校”的讲师。在书的卷首插图，他陈述了该书的主题，即中国不是神秘的东方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中华民族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的苦难，但中国人民的力量终将使它胜利。我最受吸引的地方是，他把这些用毛笔以中文写出来，辅以蓝墨水的英文翻译。

当我的父亲 J. D. 贝尔纳带我到剑桥拜访他的老朋友和同事李约瑟时，后来的联系形成了。李约瑟的书房满是中文书和中国同事，他们耐心地解答了我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是在 1957 年，1959 年——整整五十年前！——我终于前往中国，在北大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留学。这是“大跃进”开始的“痛苦年代”。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我在那里的数个月里，中国对我的吸引和我对中国的承担都增强了。

我回到剑桥和毕业以后，开始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计划。虽然我最终出版了关于这个题目的一本小书，但在 1960 年代，我愈来愈被两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分神。其一是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使我参与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政治活动。其二是“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它既

痛苦，又迷人。这两个过程在 1975/1976 年结束，正是在那时，我改变了研究领域。我意识到，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缓和，在东南亚，尤其是围绕着以色列国，紧张在增加，因此也变得更加有趣。

并不是我不再卷入中国，而是我被新题目吸引了。这其中有个个人侧面，因为我虽然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教育，没有任何犹太教（或基督教）背景，但我有一些犹太血统。因此，我开始以特别的兴趣，但是用世俗的方式研究犹太历史。我无法接受通常的目的论/宗教方法，它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拥有对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权力。根据这一观点，犹太人被视为不同于居住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其他古代民族。我却想在犹太人的背景中看待他们，他们与腓尼基人、迦南人和埃及人有着民族和文化关系。我很快意识到，所有这些民族都与古希腊人有密切联系。这实际上是古典时期，即公元前 6 到 4 世纪希腊人自己的观点。但很久以后，古希腊人在历史编纂上深深陷入 19 世纪北欧制造的“神话”中，这一神话使得他们迥然相异于他们南面和东面说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文化。

正是这一故事的不可信性引导我进入了《黑色雅典娜》规划。我开始遵从少数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希腊神话和黎凡特闪米特神话之间存在细致的相似性。从这里出发，我在两个方向上继续旅行，首先我将相似性拓展到语言，尤其是词汇，其次我开始相信，埃及影响如果不是比闪米特影响更重要的话，也是同等重要。因此，我寻找证据，以验证古希腊人的声称，即他们的宗教、数学和哲学是以埃及为基础的。

在《黑色雅典娜》的日译本序言中，我指出，我发现日本为古希腊提供了有用模式。毫无疑问，最早的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完全不同于中国，而且两种语言基本上不相联系。但另一方面，忽视、贬低或否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服饰、建筑、艺术、音乐、写作和词汇，将是荒谬可笑的。然而，西方古典学家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日本”，即希腊的。他们几乎完全从本土和北方的根源方面研究希腊文化。这种方法注定要失败。借用一下 20 世纪中国有名的领导人制定的原则，我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

土法和洋法并举”。*

如果日本模式与古希腊模式相似，那么，中国的明显的西方祖先平行物就是埃及。古埃及吸取了其他非洲和西南亚民族的精华，但它有着延续了许多个千年的文化统一，发展出了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文明，这一文明对相邻社会的文明有重大影响。同样，中国文化的一些侧面来自中亚和印度。但是，这些借用被完全整合进了本土的基础。中华文明对整个东亚具有中心意义，它给予的比它得到的要多得多。18世纪欧洲作家赞许地看到古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相似：官僚统治，对仪式和理性的强调，平民控制军队，重视稳定而非变化，书面符号有语音和语义内容等；相似性还表现在两个国家与周围社会相对位置的结构等同性。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以为，将任何一卷《黑色雅典娜》翻译成中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任务太巨大了。现在，郝田虎和程英证明我是完全错误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谢谢他们为翻译付出的精力和精神。

马丁·贝尔纳

* 这是毛泽东的话。——译者注

前言与致谢

《黑色雅典娜》背后的故事漫长而复杂，而且我相信非常有趣，足以作为知识社会学领域的个案研究，值得进行充分探讨；所以我在此只能勾勒出简要的轮廓。我接受的训练是中国研究；几乎二十年中，我做的是有关中国的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领域是 20 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关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1962 年以后，我对印度支那的战争日益关心，在英国几乎不存在任何有关越南文化的严肃学术成果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义务研究越南文化。这既是为反抗美国在那里的压迫的运动做贡献，也是因为越南本身有迷人的、极其吸引人的文明，其性质既是彻底混合的，又是完全特殊的。我也研究过日本的历史，在许多方面，越南和日本为我研究希腊提供了模式。

1975 年，我遭遇了中年的人生危机。危机的个人原因并不特别有趣。但是，在政治上，它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结束以及我意识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即将结束有关。在我看来，现在世界上危险和兴趣的中心焦点不再是东亚，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一转变使我开始关心犹太历史。我血统中分散的犹太成分会给试图适用纽伦堡法案的评估者带来噩梦，我虽然很高兴有这些犹太成分，但此前并未过多想过它们，也没有过多思考过犹太文化。正是在这一阶段，我被我“根”中的这个部分以一种浪漫的方式迷上了。我开始调查犹太古代历史，由于我本人处于边缘，我还调查了以色列人与周围民族，尤其是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的关系。我一直知道，后者说闪米特语，但我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

严肃的语言学家把二者当做单一的迦南语的方言。

在此期间，我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发现了在我看来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大量的惊人相似。有两个因素使我不能接受这些只是偶然的巧合。第一，我学习过汉语、日语、越南语和一点齐切瓦语（Chichewa，一种在赞比亚和马拉维口头使用的班图语），意识到如此数量的平行在彼此没有接触的语言中是不正常的。第二，我现在意识到希伯来语/迦南语不仅是在巴勒斯坦的山区与世隔绝的内陆一个小部落的语言，而且它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被口头使用过，只要是腓尼基人航海和定居的地方。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或者至少这些词语中间没有印欧语词根的数量巨大的多数——不是从迦南语/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借词。

在此阶段，在我的朋友大卫·欧文（David Owen）的引导下，我受到赛勒斯·戈登和迈克尔·阿斯顿的著作很深的影响，他们论述的是闪米特和希腊文明之间的一般性接触。而且，阿斯顿使我信服，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创建底比斯的传说包含真实的内核。但是，像他一样，我摒弃了埃及殖民的传说，认为它们是彻底的幻想或者搞错了身份，而相信殖民者实际上是说闪米特语的人，无论希腊人是如何记录的。

我在这个方向研究了四年，最后信服，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这些，连同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印欧语词汇，仍然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无从解释。这一不可减缩的部分习惯上被认为是“前古希腊的”，或者假定一种第三种外部语言，安纳托利亚语或者我认可的胡利安语——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我摇摆不定。但是，当我调查这些语言时，它们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希望的材料。只是在1979年，当我浏览一本切尔尼（Černý）的《科普特语词源词典》时，我才能对晚期古代埃及语有一些感觉。我几乎立刻意识到这就是那第三种外部语言。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确信，埃及语可以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希腊语词汇提供可信的词源，以及多数希腊神灵名字和许多地名的词源。把印欧语、闪米特语和埃及语词根放到一起，加上进一步研究，我现在相信，可以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希腊语词汇提供可信的解释，这在任何语言中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因此，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寻找“前古希腊的”因素了。

在我研究的开始，我就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一切都像你坚称的

那样简单和明显，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认识到呢？我读了戈登和阿斯特的书，这个问题得到了回答。他们将地中海东部地区视为一个文化上的整体，阿斯特还证实，反犹主义提供了解释，为何否认了腓尼基人在希腊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偶然发现埃及成分之后，我很快更加剧烈地卷入了“我为什么从前没有想起埃及？”的问题。它是如此明显！在希腊形成的几千年期间，埃及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最伟大的文明。希腊作家们详细记述了他们从埃及宗教和文化的其它侧面得到的恩惠。而且，我发现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更加令人困惑，因为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埃及学家，我孩提时对古代埃及极端感兴趣。显然，针对将埃及与希腊联系起来有很深的文化抑制。

在这一时刻，我开始调查有关希腊起源的历史写作，以便确定希腊人真的相信他们被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过，他们的大部分文化得自这些殖民地，以及后来在黎凡特的学习。

我又一次非常吃惊。我吃惊地发现，我开始称为“古代模式”的东西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推翻，我被教导的希腊史版本远远不是像希腊人本身一样古老，而只是在1840和1850年代才发展起来。阿斯特教导我，历史写作中对腓尼基人的态度受到了反犹主义的深刻影响；因此，我很容易将摒弃埃及人与19世纪北欧种族主义的爆发联系起来。与浪漫主义的联系以及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紧张状况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弄清楚。

因此，总的来看，《黑色雅典娜》中展开的规划耗费了我十多年的精力。在此期间，我在剑桥和康奈尔都是公众的讨厌鬼。我像老水手一样，拦下无辜的过路人，向他们诉说我最新的不完美的想法。我从这些“婚礼宾客”身上受惠良多，即便只是因为他们耐心的听讲。^{*}我更感激他们提出的极其有价值的建议，虽然我仅仅能够向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了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帮助是无法计算的。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他们对我的论题表现出来的激动，感谢他们给予了我信心，使我相信挑战如此众多的学术学科的权威不是疯狂。他们似乎相信我所说的，他们使我信服，虽然我的一些具体观点大概是错误的，但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我亏欠专家们的是一种不同的感激。他们不只是挡着我的道。我迫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不断打扰他们，请求他们提供基本信息，解释他们自己

^{*} 老水手和“婚礼宾客”的典故出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著名诗作《古舟子咏》。——译者注

的观点背后或流行的看法背后的原因。尽管我过多占用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尽管我有时搅乱了他们最珍视的信念，但他们都很有礼貌，都很有帮助，经常为了我付出相当的努力。“婚礼宾客”和专家的帮助对我的规划具有中心的、必不可少的意义。在许多方面，我把整个事情视为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努力。一个人不太可能覆盖所有相关的诸多领域。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大量的外来帮助，我也不不可避免地没有做到专题研究应该具有的彻底性。而且，我充分意识到自己没有理解或没有适当吸收我所收到的许多最好的建议。所以，读者将要发现许多事实或阐释的错误，但下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以任何方式为这些错误负责。然而，这一著作的荣誉归于他们。

首先，我愿意感谢那些男士和女士，没有他们，本书将无法完成：Frederic Ahl, Gregory Blue, 已故和受到深切哀悼的 Robert Bolgar, Edward Fox, Edmund Leach, Saul Levin, Joseph Naveh, Joseph Needham (李约瑟), David Owen, 以及 Barbara Reeves。他们以不同的比例，给予我信息、建议、建设性的批评、支持和鼓励，对这些卷书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异常繁忙的人，本身都从事着极端重要和迷人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我的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批评我经常给他们看的很初步的成果，我的感动已非语言可以表达。

我还想感谢以下的男士和女士——那些现在已逝的人们，我想记录下对他们的感激——因为他们投入时间、不怕麻烦，帮助了我：Anouar Abdel - Malek, Lyn Abel, Yoël Arbeitman, Michael Astour, Shlomo Avineri, Wilfred Barner, Alvin Bernstein, Ruth Blair, Alan Bomhard, Jim Boon, Malcolm Bowie, Susan Buck Morse, Anthony Bullough, Carol Caskey, Alan Clugston, John Coleman, Mary Collins, Jerrold Cooper, Dorothy Crawford, Tom Cristina, Jonathan Culler, Anna Davies, Frederick de Graf, Ruth Edwards, Yehuda Elkana, Moses Finley, Meyer Fortes, Henry Gates, Sander Gilman, Joe Gladstone, Jocelyn Godwin, Jack Goody, Cyrus Gordon, Jonas Greenfield, Margot Heinemann, Robert Hoberman, Carleton Hodge, Paul Hoch, Leonard Hochberg, Susan Hollis, Clive Holmes, Nicholas Jardine, Jay Jasanoff, Alex Joffe, Peter Kahn, Richard Kahn, Joel Kupperman, Woody Kelley, Peter Khoroché, Richard Kline, Diane Koester, Isaac Kramnick, Peter Kuniholm, Annemarie Kunzl, Kenneth Larsen, Leroi Ladurie, Philip Lomas, Geoffrey

Lloyd, Bruce Long, Lili McCormack, John McCoy, Lauris Mckee, Edmund Meltzer, Laurie Milroie, Livia Morgan, John Pairman Brown, Giovanni Pettinato, Joe Pia, Max Prausnitz, Jamil Ragep, Andrew Ramage, John Ray, David Resnick, Joan Robinson, Edward Said, Susan Sandman, Jack Sasson, Elinor Shaffer, Michael Shub, Quentin Skinner, Tom Smith, Anthony Snodgrass, Rachel Steinberg, Barry Strauss, Marilyn Strathern, Karen Swann, Haim Tadmor, Romila Thapar, James Turner, Steven Turner, Robert Tannenbaum, Ivan van Sertima, Cornelius Vermeule, Emily Vermeule, Gail Warhaft, Linda Waugh, Gail Weinstein, James Weinstein, 以及 Heinz Wismann。我尤其要感谢他们中的少数人,这些人强烈反对我试图要做的东西,但仍然会意地、情愿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

对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每一个人,我愿表达深深的感激,他们不仅容忍,而且鼓励我从事一个离政府系的通常关切如此遥远的项目。同样,我愿感谢特柳赖德会所(Telluride House)的所有人,许多年以来,他们对我热情好客,他们智力上的激励引导我转向新的领域。我对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学会的每一个人也很感激,1977-1978年我在那里度过了成果丰硕、非常幸福的一年。

我深深地受惠于我的出版者,Robert Young,他对我的项目充满信心,经常为我提供帮助和鼓励。与此同时,我想感谢我的编辑,Ann Scott,她为本卷书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并且以同情的的方式大大改进了文本的质量,而没有伤害我的自尊心。我深深感谢两位学术审稿人,Neil Flanagan和Holford-Strevens博士,以及文字编辑Gillian Beaumont。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本书中仍然存在的许多错误、不一致、不恰当的地方比起文本在经过他们专业的仔细审阅之前大量存在的毛病来,简直不值一提。尽管他们极其棘手的任务伴随着种种沮丧,但他们在和我交往的整个过程中异常耐心,非常令人高兴。我还想感谢Kate Grillet,她为我制作了地图和表的第一草稿,在对我匆忙、不确切的指令的阐释中,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技巧。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Sophie Bernal,她帮我做了参考书目,做勤杂工作时愉快而耐心。

从我母亲Margaret Gardiner那里得到的恩惠不可计算,她给了我基本教育和自信心。更特别的是,她提供了金钱,以便我完成这一卷书,她还为绪言提供了宝贵的编辑帮助。我还想感谢我的妻子,Leslie Miller-

Bernal, 她提出了有用的判断和批评, 但首要的是, 她提供了热情的感情基础, 如此巨大的智力事业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此。最后, 我想感谢 Sophie, William, Paul, Adam 和 Patrick, 因为他们的爱, 因为他们使我如此坚定地植根于真正要紧的事情。

转写和表音拼法

埃及语

埃及语词汇所用的拼字法是被现代埃及学家接受的标准拼字法，唯一的例外是用 ʕ 来代表“兀鹫或双重 ʕaleph ”，它经常被印刷为两个上下紧挨着的逗号。

无论古埃及语中 ʕ 的确切声音是什么，它在闪米特语手书中被转写为 r , l , 甚至 n 。这一辅音值至少直到公元前 17 世纪的第二中间期仍然保留着。在晚期埃及语中，它似乎成为一个 ʕaleph ；后来，它像南部英语的 r 一样，仅仅变换邻近的元音。 ʕ 是埃及学家使用的字母表顺序中第一个符号，我下面继续讨论其它有着晦涩或困难音值的字母。

埃及语 ʕ 对应闪米特语的 ʕaleph 和 yod 。 ʕaleph 在许多语言中都有发现，几乎所有亚非语中都有它。它是元音前的喉塞音，正如伦敦东区土话中的“ $\text{bo}^{\text{ʕ}}\text{le}$ ”或者“ $\text{bu}^{\text{ʕ}}\text{e}$ ”（“ bottle ”和“ butter ”）。

埃及语 ayin 也出现在多数闪米特语言中，它是发音的或说出来的 ʕaleph 。埃及语形式似乎与“后”元音 o 和 u 有联系。

在早期埃及语中，符号 w 写作鹈鹕小鸟，可能有纯粹的辅音值。在晚期埃及语中——对希腊语影响最大的埃及语形式——它似乎经常被读作元音， o 或者 u 。

写作 r 的埃及语符号在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通常转写为 l 。在后来的埃及语中，它似乎和 ʕ 一样弱化，仅仅成为元音的变换者。

拉丁化为 h 的埃及语和闪米特语字母似乎被读作强调的 h 。

埃及语和闪米特语 h 代表的声音类似“loch”中的 ch 。后来，它完全与字母 s 混淆。

埃及语字母 h 似乎代表着声音 hy 。它也变得与 s 混淆。

本书写作 s 的字母过去转写为 s 或 z 。

\check{S} 读作 sh 或 skh 。后来，它变得与 h 和 h 非常混淆。

k 代表着强调的 k 。我以不一贯的方式，遵从闪米特学家的普遍实践，使用 q 来代表闪米特语中的同样声音。

字母 t 大概原本读作 t^y 。但是，甚至在中期埃及语中，它就与 t 混淆。

同样， \underline{d} 经常与 d 互换。

埃及名字

埃及神灵的名字根据最常见的希腊语进行元音化：例如， $\text{ḥ}lmn$ 转写为 $Amon$ 。

君王的名字一般采用 Gardiner (1961) 著名法老的希腊名字的版本，例如 $Ramessēs$ 。

科普特语

科普特语字母表的多数字母来自希腊语，所以使用同样的转写形式。源自古埃及通俗文字的六个额外字母转写方式如下：

ϣ s

ϥ h

ϫ \underline{d}

ϣ f

ϥ h

ϫ \check{g}

闪米特语

闪米特语辅音的转写相对符合惯例。几个复杂的情形上面讲埃及语时已经提到。除此以外，还有如下情况：

在迦南语中，声音 h 和 h 融为一体。本书的转写有时反映词源的 h ，而非后来的 h 。 t 是强调的 t 。

通常转写为 th 的阿拉伯语发音本书写作 t^y 。 dh/d^y 是同样的情况。

乌加里特语中与阿拉伯语 $Ghain$ 相对应的字母转写为 \check{g} 。

闪米特语中强调的 k 写作 q ，而非埃及语中的 k 。闪米特语字母 $Tsade$

几乎肯定读作 ts, 它写作 š。在希伯来语中, 从公元前一千年代起, 字母 Shin 写作 š。但在别处, 它仅仅转写为 s, 而非 š, 因为我质疑后一发音的古代性和范围 (Bernal, 即出, 1988)。然而, 这带来与字母 Samekh 的混淆, 后者也转写为 s。字母 Sin 转写为 ś。

转写中不标明字母中点 (dagesh) 或塞-擦字母 (begadkepat)。^{*} 这是为了简单起见, 也是因为我怀疑它们在古代的范围和发生。

元音化

《圣经》马所拉本的元音化完成于公元 9 和 10 世纪, 但反映了古老得多的发音, 其转写如下:

符号名称	无装饰	带 י y	带 ו w	带 ה h
Pataḥ	א ba	—	—	—
Qāmeš	א bâ	יִ bâ	—	הִ bâh
ḥîreq	א bi	יִ bî	—	—
Šērê	א bē	יִ bē	—	הִ bēh
S ^e gōl	א be	יִ bē	—	הִ beh
ḥōlem	ב bō	—	ו bō	ה bōh
Qibûš	א bu	—	ו bū	—

弱化元音转写为:

א b^o אֲ ḥă אֱ ḥê אִ ḥô

重音符号和祷文吟诵通常不标出。

希腊语

辅音的转写是标准的方式。

υ 转写为 y。

长元音 η 和 ω 写作 ē 和 ô, 有区别性的长 α 写作 ā。

重音符号通常不标出。

希腊名字

译写希腊名字时不可能保持一致, 因为一些名字太有名了, 不得不给

^{*} 字母中点 (dagesh) 指置于希伯来字母内的点, 表示辅音重复, 或者表示辅音是塞音, 而非擦音。塞-擦字母 (begadkepat) 指古希伯来语的六个字母, 它们有两种发音, 加字母中点时为塞音, 没有时是擦音。——译者注

出它们的拉丁形式，例如 Thucydides 或 Plato，而非希腊语形式 Thoukydídēs 或 Platōn。另一方面，把鲜为人知的人名或地名改写成拉丁形式是荒谬的。因此，比较常见的名字以拉丁形式给出，而其余名字直接从希腊语译写。只要有可能，我就遵从 Peter Levi 对保萨尼阿斯的翻译，该译文保持的良好平衡符合我的趣味。但是，这意味着许多长元音在名字的转写中没有标注。

地图和表